

巴蜀印章文字考释

——巴蜀文字释读方法探索

冯 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通过比较冬笋坝墓葬所出巴蜀文字印与汉文印，分析两类形制、款式、字数相同的印章，可知巴蜀文字印实系模仿汉文印而制作。巴蜀文字体系中相当一部分文字的作用应重在表音，而并不在表意，这与巴蜀文字数量尚少的事实互为因果。而巴蜀文字的来源之一则是对汉字的借用，其发生时代当在东周以前。

关键词：巴蜀文字；巴蜀图语；巴蜀印章；文字释读

目前所知的中国早期文字，除夷、夏两系之外，^[1]巴蜀文字无疑属于另一新的文字系统。一般认为，巴蜀文字主要分布于川西平原的蜀地、川东巴地和湘西山区，最早的物证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2]下限则到战国末叶秦灭巴蜀之后。^[3]不过这个年代或许并不反映巴蜀文字的形成年代，^[4]其早期材料可能早至西周，同时在秦灭巴蜀以后，一些铭有巴蜀文字的器物仍在家族内继续流传，直至西汉早期的墓葬，仍时有此类遗物出土。^[5]

巴蜀文字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形体，一种是具有强烈图案化特征的象形符号，这种文字更多地出现于印章或作为青铜器上的简单图案；而另一种则已完全摆脱了象形的特点，并且常以书面语的形式出现。这两种形体的文字都具有文字的性质应该没有问题，学者或将前一种形体的文字称为“巴蜀文字甲”，而后一种形体的文字称为“巴蜀文字乙”。^[6]“巴蜀文字甲”的单字数量，目前所见尚不足200个，因此对这种文字性质的看法，学术界还存在分歧。不过从“巴蜀文字甲”分布地域广泛，流行时间较长，而且于秦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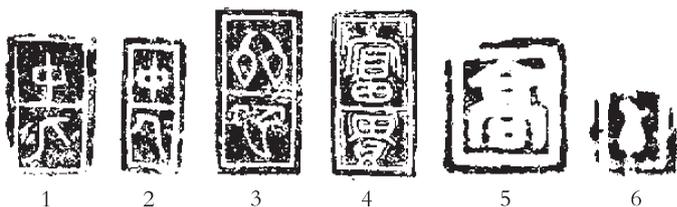
一文字之后便基本废止的现象分析，其为巴蜀民族使用的文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况且这类文字的印章形式或与汉文印章相同，^[7]也可证明其本具有文字的性质。^[8]而“巴蜀文字乙”则与良渚文化的某些文字颇多相似，^[9]这是否可以提供此种文字来源的线索，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于巴蜀文字至今还无法解读，因此，“巴蜀文字甲”的象形符号究竟是用来表意还是表音，目前还不易判断。学者或主张其中的一部分符号用以代表字义，而另一些符号则用以表音。^[10]这种思路如果对正确解读巴蜀文字有所帮助，则是学术界期待的成果。不过根据具有相互影响的巴蜀文字印章与汉文印章的比较，或许可以为巴蜀文字的解读方法进行一些探索。

冬笋坝 M50 出土了五方印章，其中巴蜀文字印2方（冬 M50：17、冬 M50：39），汉文印2方（冬 M50：14、冬 M50：15），肖形印1方（冬 M50：16）。从印章形制观察，尽管报告仅刊布了冬 M50：16、冬 M50：17、冬 M50：39 三印的钮式及钤本，但据文字介绍可知，冬 M50：39 的巴蜀文字印为鼻钮长方形印，同墓所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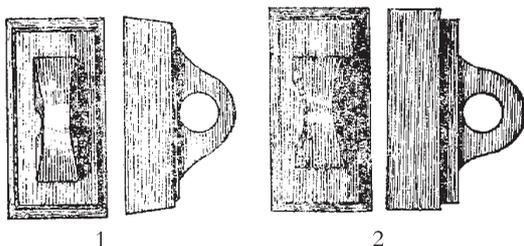


两方汉文印的形制应基本相同。同时可以参考比较的还有冬 M49 所出汉文半通日字格印，其铸白文“富贵”二字，与冬 M50 所出两方汉文印的印文款式一致（图一：4、1、2）。事实上，这种传统的汉印形式也正体现了冬 M50：39 巴蜀文字印的基本形制（图二），这意味着巴蜀文字印的制作很可能是在模仿汉文印的基础上完成的。报告指出：与船棺葬共存的两类印章中，汉文印章应由中原传入，时代较早。而巴蜀文字印则系模仿汉文印在本地仿铸的，时代应相对较晚。〔11〕这一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图一 冬笋坝墓出土印章钤本

1.冬 M50：14 2.冬 M50：15 3.冬 M50：39 4.冬 M49：14 5.冬 M2：11 6.冬 M2：14



图二 冬笋坝墓出土印章形制

1.冬 M49：14 2.冬 M50：39

尽管冬笋坝 M50 出土的冬 M50：14、冬 M50：15、冬 M50：17、冬 M50：39 四方印章铸有汉文与巴蜀文字两种不同的文字，但除冬 M50：17 印铭有三个巴蜀文字，可以判断与同墓所出的汉文印无关外，冬 M50：14、冬 M50：15、冬 M50：39 三方印章虽具两种不同的文字，但两类印章在形制上确实十分相似，皆属日字格半通印，每格之内铸铭一字（图一：1~3）。众所周知，日字格半通印体现的是秦印的显著特点，因此墓葬所出的汉文印实际应是随秦灭巴蜀后秦人影响的扩大而由秦地携入的，而这时出现的相同形制的巴蜀文字印显然只能是模仿秦印的

仿制品。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这种仿制活动只限于秦印的形制，那么这种模仿对于解读巴蜀文字印的印文内容便没有什么帮助。然而如果巴蜀文字印并不只是对秦印形制的简单模仿，而是以巴蜀文字翻造秦印，那么这两类印章就不仅具有相同的形制，而且也应具有相同的内容，这当然提供了我们据汉文印章对读巴蜀文字的可能。

事实上，印章的仿制仅停留在对原印形制的模仿，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说不存在，但毕竟很小。仿制印章，特别是对那些箴言玺而言，仅仅仿制其形制是毫无意义的，模仿者只有同时接受了原印的内容与形制，才能达到以本族文字表达汉文印章内容的目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同一座墓葬中发现有相同形制的汉文印与巴蜀文字印，我们就有理由通过汉文印文去比读巴蜀文字。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据汉文印文释读巴蜀文字便不会困难。M50 所出两方汉文印的内容为“中仁”（图一：1、2），学者读为“忠仁”，〔12〕笔者则倾向读为“忠信”。战国秦系文字的“信”或从“仁”声，〔13〕是为明证。战国秦玺文字又见“忠仁”、“忠仁思土”〔14〕，也应读为“忠信”及“忠信思土”。考虑到古玺文又有“云子思土”〔15〕，知“思土”的意思应是思念故土，而“仁”意为爱人，其与“信”为不背所传达的意义并不相同。显然，忠信不背与不忘旧土的愿望更为适合。因此，以汉文印文对读巴蜀文字，则巴蜀文字印的“𠄎𠄎”二字便也应读为“忠信”（图一：3）。

“巴蜀文字甲”本出象形，这一点通过大量巴蜀文字的直观印象便可明了。因此，对于那些象形特征鲜明的文字而言，判断其字形的正反结构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文字正反的误识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巴蜀印文的释读次序，而且还会对有关巴蜀文字造字方法的研究带来困扰。

目前所见对冬 M50：39 印的文字结构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插图 60：10 之钤本以“𠄎𠄎”为正，而《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1738 号之钤本则倒之以“𠄎𠄎”为正，

二者孰是，可以通过对相关印章的分析加以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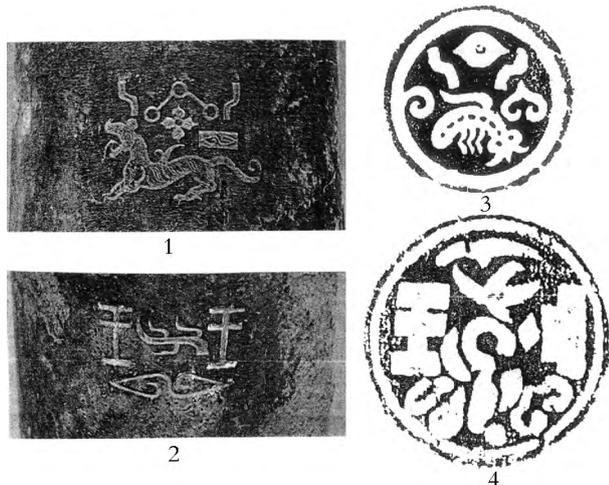
对字形正位的分析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路：

其一，传出四川广汉的周代铜钲铸有虎纹（图三：1），^[16]虎上饰有三星，星下有四方璇玑图像，实系巴蜀文字；旁有巴蜀文字二字，一呈倒“八”字形，一为横置的梭状卷云形。这些文字和图像的铸刻方位与铜钲的正向恰好相反，因此可知相关文字的正位结构。

其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铜钲，上铸巴蜀文字四字（图三：2），^[17]其中两“王”字明显取形于汉字，或者在巴蜀文字中仍具有君王的意义；两“王”字之间则有类似植物样的字形，其下便是横置的梭状卷云形文字。此三字的正位结构也可明晓。

其三，四川芦山清仁乡出土巴蜀文字印，上铸五个巴蜀文字（图三：3），^[18]根据蚕形象形文以及其上的倒“八”字文字，可以确定印章的正位，由此则知，印文右侧的中央尖凸的天盖符号实为“天”字，此与纳西文的“天”结构全同，乃是对当时人们所认识的天极呈现中央凸耸的璇玑的天盖形象的忠实写实，^[19]这直接说明了该字是以尖凸向上为其正位结构。

根据这些已知的巴蜀文字比读未识之字，可以对其字形结构正倒情况的判断有所帮助。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战国玺印，印文见有“王”、“天”二字（图三：4），^[20]以此二字定正玺印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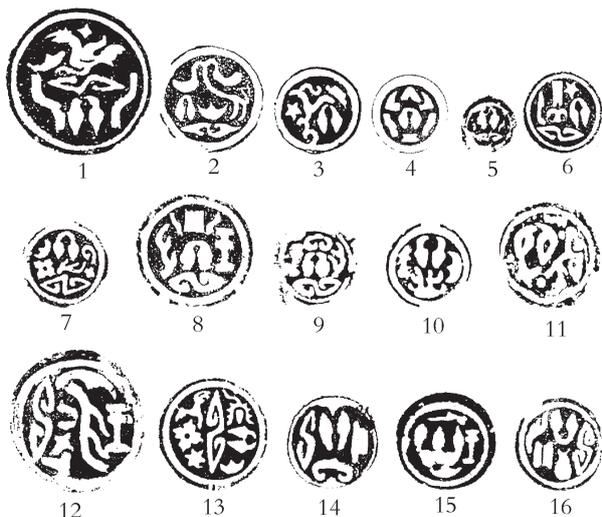


图三 巴蜀文字及印章

1.周代铜钲铸刻 2.战国铜钲铸刻 3、4.巴蜀文字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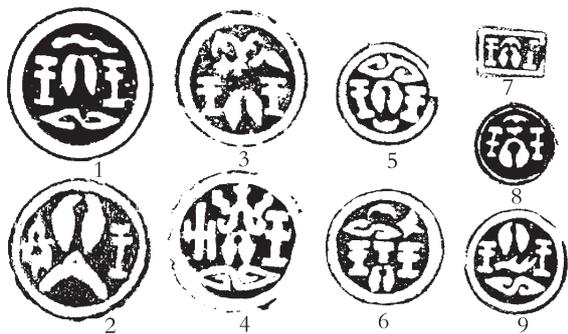
位，则知同印所见之“𪛗”字当为正位结构。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检讨其他巴蜀文字印，有些玺印即具有明显的动物形象，这当然有助于判断“𪛗”字的正倒。如图四：1~3有飞禽形象，其中1、2两印同时兼有倒“八”字文或梭状卷云形文，可以证明“𪛗”为正位。而图四：4~8有倒“八”字文或梭状卷云形文，图四：9兼有“天”及梭状卷云形文，都可证明巴蜀文字之“𪛗”为正位。而图五所录诸印皆同铸“王”字，或兼有梭状卷云形文，同样证明巴蜀文字的“𪛗”应为正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巴蜀文字圆印的设计有时是可以旋读文字的，如图四：12同铭“王”、梭状卷云形文、植物形文及“𪛗”，但只有“王”字为正位，其他文字皆为侧位。这种情况也见于图四：13，而图四：14、15两印印文分别以“天”、“王”为正位，梭状卷云形文为侧位，“𪛗”字甚至呈现倒位。相同的例证在图四：16上也反映得相当清楚。然而，尽管巴蜀文字印的这种设计使得某些圆印上的文字并不处于正位，但已有的证据并不影响我们判断巴蜀文字“𪛗”应为正位的事实。



图四 巴蜀文字印

澄清这一点对于探讨巴蜀文字的造字方法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冬笋坝 M50 所出的两方汉文印章铭作“中仁”，读为“忠信”，这种汉文的通假现象是否暗示了巴蜀文字的“𪛗 𪛘”二字其实也并不重在表意，而应重在表音，这种可



图五 巴蜀文字印

能性当然不能排除。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考虑，那么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巴蜀文字的“冬”字由于颇象两垂叶之形，其枝或连或断，没有分别，这实际与甲骨文、金文的“冬”（终）字的形构极其相似（图六）。不仅如此，汉字“忠”、“冬”（终）二字的上古音并在端纽冬部，双声叠韵，读音全同。因此，巴蜀文字的“冬”可能即是借用了汉字“冬”字的字形和读音，其用以表音的做法是相当清楚的。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借用汉字虽然是巴蜀文字创制的方法之一，但表音却并不应该是其唯一的目的。



图六 甲骨文、金文“冬”（终）

1.《菁华》2.1 2.《英藏》1784 3.亡终戈 4.颛鼎 5.此鼎

冬笋坝 M2 也同出两方印章，其中冬 M2：11 为汉文印（图一：5），冬 M2：14 为巴蜀文字印（图一：6）。两印俱作正方形，白文一字，且皆阴刻边框，形式相同，似也属于仿刻。这一推测同样为我们据汉文印文对读巴蜀文字提供了条件。汉文印铭有“高”字，如此，则巴蜀文字印的文字也应读为“高”。此字于其他巴蜀文字印也有所见（图四：16）。

我们对上述三个巴蜀文字读音的确定，当然有助于了解具有这些文字的其他印章的意义。毫无疑问，由于巴蜀文字的数量尚少，文字的通假应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据音据义而假借转注，也是巴蜀文字使用时的常见方法。事实上，目前发

现的巴蜀文字数量有限，这样的文字体系显然不足以完成表意的工作。换句话说，由于巴蜀文字体系中相当一部分文字的作用重在表音，这也决定了巴蜀文字的单字数量不可能很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巴蜀文字中至少有一部分文字是源于对汉字的借用，而且据相关文字的结构特点判断，这种借用应该在比东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巴蜀文字的“冬”如果可以认为就取自于汉字的“冬”，那么其反映的字形特征便与商代甲骨文及金文的字形特征颇为一致，这当然暗示了巴蜀文字可能出现的年代，这一年代事实上与目前考古学所提供的早期巴蜀文化所存在的年代正相符合。

巴蜀文字印与汉文印的共存现象为我们释读巴蜀文字提供了契机，如果这两类印章在形制、款式、字数诸方面均表现出相同的特征，那将意味着我们有理由通过共存的汉文印文对读巴蜀文字。假如这样的解读方法尚有意义，那么很明显，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模仿汉文作品的巴蜀文字材料的丰富，对于解读巴蜀文字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注释：

- [1] 参见 a.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b.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c.冯时：《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韩国古代史探索》创刊号，2009年4月。
- [2] 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文物》1976年第7期。
- [3] 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的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
- [4] 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 [5] a.四川省博物馆、绵竹县文化馆：《四川绵竹县西汉木板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4期；b.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 [6]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 [7]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 [8] 同 [6]。
- [9]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黑陶文字图版、第15页，吴越史地研究会，1937年。
- [10]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b.罗伯特·琼斯著，杨秋莎译，秦学圣校，《四川出土青铜晚期印章》，《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 [11]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9页。
- [12] a.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古文字学论集初编》，第522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b.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522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 [13] 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13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4] 庄新兴编著：《战国玺印分域编》，第51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 [15] 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第442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编者读“思土”为“思士”，不可从。
- [16]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3卷《巴蜀》，图118、119，文物出版社，1994年。
- [1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3卷《巴蜀》，图187。
- [18]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图226，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
- [19] 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91~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20]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图224、225。

（上接第17页）

此次四马溪遗址汉墓的发现，丰富了三峡地区汉墓考古材料，也填补了重庆主城区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个别阶段墓葬发现的空白，为今后深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均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领队：李大地

发掘：黄伟 徐高明 孙治刚

上官林全 冯硕 王银来

修复：蔡远富 熊灿

绘图：朱雪莲 程涛

摄影：董小陈 陈晓鹏

执笔：孙治刚 黄伟 李大地

刘露

注释：

- [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忠县罗家桥战国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451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 [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郫县风情园及花园别墅战国至西汉墓群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77~315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3] 重庆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云阳走马岭墓地》，第12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4]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忠县老鸪冲遗址（墓葬部分）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84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11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 [6] 蒋若是：《西汉五铢钱断代》，《秦汉钱币研究》，第111页，中华书局，1997年。
- [7] a.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71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b.陈云洪、颜劲松：《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 [8]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118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9]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326页。
- [9]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324页。
- [10]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324页。